

代际居住安排与子女主观幸福感^{*}

李新恒 郭继强

【摘 要】现有关于家庭代际居住安排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老年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较少考虑对成年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事实上,代际居住安排是父母和子女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文章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区分子女与父母及配偶父母的居住距离,探讨代际居住安排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显著;(2)近距离居住的幸福提升效应在城市群体、女性、父母年龄均在 70 岁及以下、父母不再工作的样本中更明显;(3)近距离居住使父母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及情感支持也更多,代际情感支持和慰藉是近距离居住提升子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原因;(4)两代人选择邻近而又不共同居住,即“一碗汤的距离”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最大。文章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代际居住安排 子女主观幸福感 代际支持 情感支持

【作 者】李新恒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郭继强(通讯作者)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引 言

居住安排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在传统中国社会,多代同堂是一种理想的居住安排,发挥着平滑代际养育、教育、感情陪伴等多重作用,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根基。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家庭成员的迁移时常发生,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就业,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拉大;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也往往较远。此外,社会文化观念的演变也对传统的多代同堂的居住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王跃生,2014;杨菊华、何绍华,2014)。中国多代同堂家庭的比例已经显著下降。1982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二代户家庭占比为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与政策选择研究”(编号:20&ZD076)的阶段性成果。

64.72%，三代户家庭占比为 17.13%，而一代户家庭仅占 13.77%。到 2020 年，一代户已经成为占比最大的家庭类型，占总家庭户的 49.50%，二代户和三代户家庭的占比则分别下降至 36.72% 和 13.26%。整体而言，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相对较近。Lei 等 (2015) 研究发现，在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中，有 31% 与至少一个子女住在同一社区，另有 13% 与至少一个子女住在同一个县。家庭现代化理论指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将从传统的扩展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 (唐灿, 2010)。当代中国家庭居住安排的变迁与家庭现代化理论相契合，深刻影响了传统家庭功能的实现。在当前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居住安排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家庭的功能、实现家庭整体幸福感的最大化值得深入探讨。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已对代际居住安排与老年父母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分析。例如，Roh 等 (2022) 基于韩国数据的研究发现，相较于独居老年人，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明显更高。许琪 (2018) 将亲子居住模式划分为与儿子同住、与女儿同住、与子女邻近居住和远离子女居住 4 种类型，发现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既取决于同住子女的性别，也取决于不同住子女与老年人的居住距离。相比之下，与女儿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最有利，而远离所有子女居住最不利。任强和唐启明 (2014) 在划分居住类型时考虑了是否有配偶及孙子女的情况，进而将老年人的居住模式划分为 10 种。研究结果表明，在三代家庭生活的老年人幸福感较强。孙涛等 (2018) 的研究则发现，最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居住安排是与子女保持“一碗汤的距离”，这种距离既可以保留同住的诸多优势，又可以避免同住带来的一些问题。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表明，与子女同住或邻近居住能够提升老年父母的幸福感。家庭居住安排是父母和子女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关乎整个家庭的福祉，仅考虑其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完整的，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家庭居住安排对子女幸福感的影响。

此外，在以父权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父系多代同住是主要的居住方式，父母最有可能与儿子共同居住。因此，在研究代际居住安排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很少区分成年子女是与父母还是与配偶父母同住。然而，研究居住安排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必要对此进行区分。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父母和配偶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不同，子女对父母和配偶父母的代际支持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Yu 等 (2018) 发现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几乎没有母职惩罚，而与配偶父母同住的女性面临的母职惩罚最大。张烨霞等 (2007) 研究发现，男女打工者在外务工后均会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女性打工者会给予配偶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从夫居传统的式微，婚后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情况日益多见 (金一虹, 2010; Grujters 等, 2019)。从数据来看，2000 年，只有 2.51% 的已婚夫妇与女方父母同住，从妻居现象十分罕见 (杨菊华, 2008; 巫锡炜、郭志刚, 2010)。到 2010 年，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增至 11.5%，这种居住安排在城市及发达地区的年轻夫

妇中更为普遍(许琪,2013;Gruijters等,2019)。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数据,重点分析了代际居住安排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代际居住安排是否影响子女主观幸福感?二是与父母和配偶父母的居住安排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三是与父母的居住安排如何影响子女主观幸福感?通过探讨家庭代际居住安排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结合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的相关文献,本文尝试提出最优的家庭代际居住安排,以实现家庭整体幸福感的最大化。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费孝通(1983)将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归结为“反馈模式”,即每一代都抚育下一代,下一代成年后再赡养年老一代。不少学者在反馈模式论的基础上,以交换关系来理解代际关系,即“代际交换论”(韦宏耀、钟涨宝,2016;陶涛等,2018)。代际交换包括经济、照料和情感3个维度。影响代际交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代际居住安排。研究普遍发现,代际交换存在邻近效应,即相较于近距离居住的情形,居住距离较远的两代人之间的交换更少(Michielin等,2008;谢桂华,2009;吴伟,2021)。在中国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加速转型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心逐渐下移,代际居住安排由以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为主转移到以支持子代应对内外部压力和社会风险为主(李婷、胡文波,2021),向下的代际支持对子代家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隔代照料是父母对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方式之一,通常要求父母与子女同住或者邻近居住,这一居住安排有利于父母帮助育儿或为子女提供家务照料等服务,这些帮助能够极大地缓解子女的家庭负担,使其得以安心工作(宋月萍,2019),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不仅如此,近距离居住时,父母在当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也可以为子女提供事业和生活上的帮助(卢洪友等,2017)。此外,与父母近距离居住也有利于子女产生对家庭的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子女在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进而带来幸福感的提升。相反,与父母居住距离较远会减少子代家庭获得的代际支持,难以满足子女对家庭的情感需求,幸福感可能随之下降。

作为代际交换,子女也会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在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老年人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提供的情感慰藉和日常照料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Xiang等,2015;贾仓仓、何微微,2021)。有研究表明,代际经济支持也依赖于较近的居住距离(吴伟,2021),情感上的慰藉往往需要面对面交流,子女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父母提供照料服务则更需要邻近或者共同居住。因此,近距离居住能够增加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改善父母的健康状况,提升父母的幸福感,进而带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从责任内化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

的家庭主义伦理强调家庭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家庭内部各成员承担无条件的、无限的相互照顾和扶持的责任(刘汶蓉,2013;陶涛等,2018)。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照料也是一种“责任内化”。履行相应责任符合传统文化规范的要求,因而也能够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

近距离居住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规范中,长辈的权力和威望更高,后辈则处于从属地位。近年来,随着父权制文化的式微,老年人在文化传承和家庭事务决策等方面的权威下降(金一虹,2010;张新辉、李建新,2020),家庭内部代际摩擦更容易产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网络语言和社会交往方式涌现,代际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的差异使子女与老年父母在沟通和表达方面存在诸多障碍,进一步增加了代际矛盾风险(Szydlik,2008;尹新瑞、吴帆,2019)。以较为普遍的隔代照料为例,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在教养观念、教养内容、教养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可能会引发家庭矛盾(张杨波,2018)。因此,更近的代际居住安排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代际矛盾和冲突,进而降低子女的主观幸福感。

与父母和配偶父母的居住安排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是基于血缘的,是人类社会中最原始最普遍的一种感情(黄启祥,2015)。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增加双方的代际交换,即便存在矛盾也更容易解决,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可能更高。在父权制的文化背景下,男性仅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而不需要对配偶父母承担养老责任。即便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双方的联系和代际交换也相对较少(张烨霞等,2007)。女性被同时赋予了育儿和赡养公婆的责任。一方面,近距离居住使公婆能够为其提供隔代照料,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提升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可能成为家庭中的非正式照料者。更近的居住距离对女性而言意味着更多的非正式照料负担,这可能会加剧其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降低其劳动市场参与,损害其精神健康和主观幸福感(Le等,2023)。因此,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复杂。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与老年父母近距离居住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近距离居住使子女能够得到更多来自父母的支持,给予父母的支持也会更多,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得以提升;另一方面,近距离居住也面临着家庭关系复杂化的问题,以及更多的潜在家庭纠纷和矛盾,降低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此外,与父母或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可能存在差异性影响。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实证分析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该数据集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区、家庭、个人等多层次的数据,样本量大、代表性强,已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之一。CGSS 分别在 2006 和 2017 年的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与其父母的居住安排,但仅在 2017 年的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本文仅使用 2017 年 CGSS 调查数据。2017 年的 CGSS 问卷由三大模块构成,其中,家庭问卷模块提供了家庭居住安排的相关信息,包括父母及配偶父母的居住情况,可以满足本研究的需要。该调查家庭问卷模块仅有 4 132 个有效样本,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健在的已婚样本,在删除掉基本信息有缺失值及双方父母信息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 1 221 个。

(二) 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该变量对应的问卷中的问题是“请给您目前的幸福感评分”,采用自评得分的方法,最低 0 分,最高 10 分,分数越高代表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反之则越低。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代际居住安排。CGSS 调查中对应的问题是“您跟您父母或配偶父母联系情况:住处离您家多远”,分别询问了受访者与父母及配偶父母的居住距离,取值范围为 0~6:0“住在一起”;1“隔壁、同栋楼或者同邻巷”;2“走路 15 分钟内到达”;3“车程 30 分钟以内”;4“车程 30 分钟至 1 小时以内”;5“车程 1 小时至 3 小时以内”;6“车程 3 小时以上”。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本文将居住距离细分为两个测量:一是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取与父母居住距离的最小值;二是与配偶父母的居住距离,取与配偶父母居住距离的最小值。居住距离划分为两类,即近距离居住(初始取值范围为 0~2)、远距离居住(初始取值范围为 3~6),并将近距离居住赋值为 1,远距离居住赋值为 0。参考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文献(丁述磊等,2024),本文选取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0 表示女性,1 表示男性)、受教育年限、就业(有工作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对数、受访者的子女数量、受访者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有未成年子女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则是城市(居住在城市赋值为 1,农村赋值为 0)。

(三) 模型设定

考虑到主观幸福感变量属于有序多分类离散变量,具有从低到高的排序特征,本文使用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y_i = F(\beta Distance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y_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受访者 i 的主观幸福感。 $Distance_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受访者 i 与其父母或配偶父母的居住距离, X_i 表示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F(\cdot)$ 为某非线性函数,具体形式为:

$$F(y_i^*) = \begin{cases} 1 & y_i^* < \mu_1 \\ 2 & \mu_1 < y_i^* < \mu_2 \\ \vdots & \vdots \\ J & y_i^* > \mu_{J-1} \end{cases} \tag{2}$$

其中, $\mu_1 < \mu_2 < \mu_3 < \cdots < \mu_{J-1}$ 称为切点, 为待估参数, y^* 是 y 的背后存在的不可观测的连续变量, 称为潜变量 (Latent variable), 满足:

$$y_i^* = \beta Distance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tag{3}$$

为了展示代际居住安排的可能演变, 本文对比了 2006 和 2017 年两次调查时受访者与父母 (包括与配偶父母) 的居住距离分布情况, 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 相较于 2006 年, 2017 年受访者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大幅下降, 其他类型居住安排的比例均有所上升, 但远距离居住比例上升幅度不大。这表明, 在考察期间 (2006~2017 年), 虽然代际居住安排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代际同住的比例仍然较高, 反映出传统多代同堂文化影响的持久性。包括代际同住在内的近距离居住的比例从 2006 年的 73.71% 下降至 2017 年的 64.86%, 下降幅度较小, 依然是最为常见的代际居住安排 (Lei 等, 2015)。这些发现与既有关于中国家庭居住安排变迁的文献结论基本一致。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 受访者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6.954。与父母近距离居住的受访者占比为 35.6%, 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的受访者占比为 35.4%。年龄的均值为 39.334, 男性样本占比为 45.4%。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 8.002 年。样本中 74.9% 的受访者有工作, 家庭收入的对数的平均值为 11.315, 平均子女数量为 1.438 个, 69% 的受访者有未成年子女, 68.5% 的人居住在城市地区 (见表 2)。本文还对代际居住距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主观幸福感和与父母近距离居住明显正相关 ($r=0.103, p=0.008$), 和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不相关 ($r=0.006$,

表 1 受访者与老年父母居住距离 单位: %

居住距离	2006 年	2017 年
住在一起	52.81	40.70
隔壁、同栋楼或者同邻巷	8.77	10.51
走路 15 分钟内到达	12.13	13.65
车程 30 分钟以内	10.42	15.77
车程 30 分钟至 1 小时以内	6.90	6.95
车程 1 小时至 3 小时以内	4.46	4.72
车程 3 小时以上	4.50	7.70

数据来源: 根据 2006 和 2017 年 CGSS 数据整理。
注: 已根据 CGSS 抽样方案对样本进行加权。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 (N=1221)

变 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幸福感	6.954	0	10
与父母居住距离	0.356	0	1
与配偶父母居住距离	0.354	0	1
年龄	39.334	19	76
性别	0.454	0	1
受教育年限	8.002	0	16
就业	0.749	0	1
收入水平	11.315	0	16.811
子女数量	1.438	0	12
未成年子女	0.690	0	1
城市	0.685	0	1

p=0.841)。这为之后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序次变量,因此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是较为合适的。结果显示,模型 1 和模型 3 中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 2 和模型 3 中与配偶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与父母和配偶父母的居住距离对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与父母近距离居住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有提升作用,而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并不能显著提升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如下。年龄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而性别、收入水平等其他控制变量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显著。

(二) 内生性处理

基准回归分析可能受到反向因果问题的干扰。一方面,正如本文理论分析所论述的,与父母更近的居住距离有助于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幸福感更高的受访者也可能与父母的关系更好,进而选择与父母近距离居住。此外,本文也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因此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居住安排的文献大多选择兄弟姐妹数作为工具变量,但由于受访者的兄弟姐妹数也可能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这一工具变量在此处并不合适。考虑到数据的具体情况,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为除自身居住距离外其所在省份家庭居住距离的平均值。平均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地的文化和传统,每一个家庭的居住安排均会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这并不会直接影响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因此适合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这一方法在文献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宋月萍,2019)。

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看,对于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

表 3 基准回归分析(N=122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与父母居住距离	0.155*** (0.053)		0.152*** (0.050)
与配偶父母居住距离		0.059 (0.066)	0.052 (0.067)
年龄	-0.009** (0.004)	-0.009** (0.004)	-0.009** (0.004)
性别	-0.114* (0.065)	-0.063 (0.065)	-0.101 (0.067)
受教育年限	0.016*** (0.005)	0.016*** (0.005)	0.016*** (0.005)
就业	-0.064 (0.073)	-0.072 (0.073)	-0.062 (0.073)
收入水平	-0.010 (0.015)	-0.011 (0.015)	-0.010 (0.015)
子女数量	0.065* (0.039)	0.060 (0.039)	0.063 (0.039)
未成年子女	-0.079 (0.079)	-0.077 (0.079)	-0.077 (0.079)
城市	-0.057 (0.079)	-0.069 (0.079)	-0.049 (0.080)
R ²	0.020	0.019	0.020

注:模型中均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Kleibergen-Paap rk 的 LM 统计量 p 值为 0.000, 显著拒绝原假设; 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 Cragg-Donald 的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情况。工具变量分析的结果如表 4 所示。结果表明, 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提升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 与配偶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仍不显著, 表明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有限。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采用更换核心变量的测量和倾向匹配得分等方法, 重新考察代际居住安排和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替换变量是常用的稳健性检验方式之一。此处本文采用主问卷中的另一个问题衡量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 即“总的来说, 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该问题受访者回答的取值范围为 1~5, 数值越大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定序变量, 因此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5 模型 6 所示。从结果来看, 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提高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这一结果与基本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表明基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较为稳健。

在研究代际居住安排时, 现有文献重点关注了同住的影响。因此, 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的方式, 本文分析了代际同住这一独特的居住安排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模型 7 所示。结果表明: 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与父母共同居住能够提升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这证明基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较为稳健。

此外, 本文还更换了居住距离的分类方式。在基础回归分

表 4 内生性处理 (N=1221)

	与父母的居住距离	与配偶父母的居住距离
	模型 4	模型 5
居住距离	0.252*** (0.031)	0.091 (0.137)
R ²	0.094	0.070

注: 表中回归模型控制了表 3 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若无特别说明, 下表同。

表 5 替换变量的回归结果 (N=12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为代际同住	更换居住距离的分类方式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与父母居住距离	0.134** (0.065)	0.155** (0.066)	0.206*** (0.070)
R ²	0.033	0.042	0.021

析中, 本文将同住、住隔壁、同栋楼或者同邻巷和走路 15 分钟以内到达的居住距离界定为近距离居住。此处, 本文进一步将车程 30 分钟以内也划分为近距离居住。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 距离 30 分钟以内的车程也相对较为方便。分析结果如表 5 模型 8 所示, 这一结果同样印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为排除样本选择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中近距离居住和远距离居住的子女的主要特征进行平衡性处理,结果如表6所示。在运用近邻匹

表6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N=1221)

	近邻匹配 模型9	最优半径匹配 模型10	核匹配 模型11
与父母居住距离	0.192*** (0.063)	0.119*(0.069)	0.147** (0.071)
R ²	0.025	0.023	0.025

配、最优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等方法平衡样本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的子女相对于远距离居住的子女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四) 异质性分析

1. 城乡差异

无论城乡,老年人独居均呈现出增长态势,但城乡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代表了社会、经济和制度甚至是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而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较为滞后,文化上更加保守,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力更强。在大多数城市老年人可以在经济上独立的时候,相当多的农村老年人仍然需要依靠子女的经济赡养(李婷、胡文波,2021)。此外,农村地区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普遍较近,对于儿子来说,结婚后一般选择与父母居住在同一村庄,而女儿也一般嫁到附近的村庄。鉴于此,还需要关注居住距离对子女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表7中模型12和模型13给出了区分城市和农村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城市地区的样本中,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居住在城市的受访者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在农村地区样本中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居住距离的影响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差异,近距离居住的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市群体中。

2. 性别差异

在代际支持内容上,儿子和女儿被认为需要对老年父母承担不同的赡养责任(李翌萱,2020)。因此,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按性别进行划分,分别研究男性和女性与父母近距离居住的影响。结果如表7模型14和模型15所示。结果显示只有在女性样本中,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提升女性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往往面临着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与父母居住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城市	农村	女性	男性	父母至少有一人 在70岁以上	父母均在 70岁及以下	父母至少有 一人有工作	父母均 没有工作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与父母居住距离	0.228*** (0.082)	0.072 (0.120)	0.314*** (0.094)	0.035 (0.097)	0.139 (0.104)	0.185** (0.088)	-0.119 (0.139)	0.252*** (0.076)
R ²	0.027	0.028	0.036	0.019	0.052	0.022	0.037	0.027
样本量	836	385	667	554	471	750	295	926

更近能得到更多来自父母的支持。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对男性影响较小,因此幸福感提升效应较弱。

3. 父母年龄及是否工作的差异

本文按照父母的年龄和是否工作划分了不同的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 模型 16 至模型 19 所示。结果显示,调查样本父母的年龄均在 70 岁及以下时,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父母至少有一方在 70 岁以上时,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当父母年龄较大时,体力和精力逐渐下降,能够为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减少,子女反而可能需要为父母提供更多的非正式照料,损害其精神健康和主观幸福感(Le 等,2023)。问卷中还询问了父母和配偶父母“有没有在工作”。根据父母的工作情况,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父母至少有一人在工作”和“父母均没有工作”两个子样本。在父母均没有工作的样本中,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至少有一方父母在工作时,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当父母均没有工作时,父母有更多的时间为子女提供家庭照料和情感支持,因此更可能带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五) 机制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而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和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不相关。本文将进一步探究与父母的居住空间安排影响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存在明显的邻近效应,即居住越近,代际支持越多,这可能是近距离居住能够提升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原因。为此,利用两步法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1. 向下代际支持及其邻近效应

更近的居住距离能够使子女更容易获得来自父母的帮助,比如育儿照料和家务劳动等,缓解子女的家庭负担。同时,更近的居住距离也使代际情感交流更加方便。因此,近距离居住可能通过增加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如下问题“过去一年,您自己父母是否经常为您提供以下帮助?”,包括“给钱”“帮助料理家务(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小孩或其他家人”“听您的心事或想法”,选项分别有“很经常”“经常”“有时”“很少”“完全没有”。本文将“很经常”和“经常”赋值为 1,其他情况赋值为 0。表 8 结果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时,子女得到父母的帮助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更多(模型 20 至模型 22),证明向下的代际支持存在邻近效应。

表 8 模型 23 的结果表明,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考虑到样本的平均年龄,接受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可能会损害而不是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生活照料的回归系数同样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父母帮助料理家务虽然能缩短夫妻整体家务劳动时间,但

夫妻之间家务劳动不平等有可能加剧(Hu等,2021)。情感交流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成年子女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近距离居住时,父母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慰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的压力,提升子女主观幸福感。模型22和模型23的结果共同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促进代际情感交流,而更多的情感交流能够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可见父母倾听子女的心事和想法是与父母近距离居住提升子女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机制之一。

表8 向下代际支持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N=1204)

	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情感交流	主观幸福感
	模型 20(Probit)	模型 21(Probit)	模型 22(Probit)	模型 23(有序 Probit)
与父母居住距离	0.167*(0.086)	0.671*** (0.086)	0.183** (0.087)	0.131** (0.066)
经济支持				-0.072 (0.068)
生活照料				0.049 (0.069)
情感交流				0.325*** (0.067)
R ²	0.094	0.141	0.031	0.026

2. 向上代际支持及其邻近效应

向上代际支持的邻近效应已经被许多文献证实(谢桂华,2009;吴伟,2021)。近距离居住使子女能够为父母提供更多的代际支持,这不仅符合传统孝道观念的要求,还可以改善父母的健康状况。因此,近距离居住可能通过增加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在问卷中受访者需要回答如下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以下帮助?”,包括“给钱”“帮助料理家务(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小孩或其他家人”“听他(们)的心事或想法”,选项分别有“很经常”“经常”“有时”“很少”“完全没有”。本文将“很经常”和“经常”赋值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表9结果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时,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支持包括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更多(模型25和模型26),但经济支持并没有因为更近的居住距离而显著增加或减少(模型24),这可能是因为随着银行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经济支持已经不再依赖于彼此之间的居住距离。这些结果表明向上的生活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存在邻近效应。

表9中模型27的结果表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未能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原因可能是这两者可以视为子女的义务,甚至可能是一种负担。情感交流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老年人面临着孤独等问题,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子女时常倾听父母的心事和想法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能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模型26和模型27的结果共同表明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促进代际情感交流,而更多的情感交流能够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可见子女倾听父母的心事和想法也是与父母近距离居住提升子女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机制之一。

表 9 向上代际支持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N=1212)

	经济支持 模型 24(Probit)	生活照料 模型 25(Probit)	情感交流 模型 26(Probit)	主观幸福感 模型 27(有序 Probit)
与父母居住距离	-0.067(0.088)	0.567*** (0.090)	0.182** (0.093)	0.134** (0.066)
经济支持				0.077(0.071)
生活照料				0.051(0.073)
情感交流				0.354*** (0.085)
R ²	0.032	0.085	0.071	0.026

(六) 进一步分析

“一碗汤的距离”是指子女从自己家中给老人住处送去一碗热汤,汤送到还不会变凉,用此来形容亲子间居住相对独立,又不失亲密的距离(Sheldon, 1948; 孙涛等, 2018)。与更远的居住距离相比,“一碗汤的距离”能够提供更多的代际支持,满足父母和子女双方在照料和情感等方面的需求;与共同居住相比,双方又能享受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避免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居住距离划分为代际同住、“一碗汤的距离”(包括隔壁、同栋楼或者同邻巷和走路 15 分钟内到达)、车程 30 分钟以内、车程 30 分钟至 1 小时以内、车程 1 小时至 3 小时以内和车程 3 小时以上,并以车程 3 小时以上作为参照组,分别设定不同居住距离的虚拟变量,估计不同居住距离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表 10 的结果表明,“一碗汤的距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大于其他居住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其他居住距离相比,“一碗汤的距离”更能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孙涛等(2018)的研究发现,“一碗汤的距离”能够更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结合他们的研究,“一碗汤的距离”即邻近而又不同住或许是家庭幸福感最大化的居住安排。

表 10 “一碗汤的距离”与子女主观幸福感(N=1221)

	模型 28
代际同住	0.276** (0.111)
“一碗汤的距离”	0.324*** (0.105)
车程 30 分钟以内	0.253** (0.100)
车程 30 分钟至 1 小时以内	0.169 (0.113)
车程 1 小时至 3 小时以内	0.136 (0.119)
R ²	0.022

五、结论与启示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家庭居住安排发生了显著变化,老年人逐渐从与子代共同居住向独立居住转变。家庭居住安排的变化对老年人及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均可能产生影响,本文重点关注家庭代际居住安排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有如下几点发现。第一,与父母近距离居住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而与配偶父母近距离居住并未带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近距离居住的幸福感的提升效应在城镇地区样本和女性群体中更加明显,在父母

均为70岁及以下及父母均没有工作的样本中也更加突出。第三,机制分析发现近距离居住使子女能够更容易获得来自父母的支持,包括物质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子女同时也为父母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特别是代际情感支持是子女主观幸福感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第四,本研究证实了家庭内部向下的代际支持存在邻近效应。中国情景下的研究发现家庭内部向上代际支持存在邻近效应(谢桂华,2009;吴伟,2021),本文补充了家庭向下代际支持邻近性的相关文献,提供了有关邻近居住代际影响的经验证据。最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两代人选择邻近居住而非共同居住对子女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最大。结合孙涛等(2018)的研究,本文认为“一碗汤的距离”或许是最优的代际家庭居住距离。在当前人口快速老龄化及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评估代际居住安排对家庭内部成员幸福感的影响,以探索实现家庭整体幸福感最大化的居住方式。

“一碗汤的距离”对提升子女和父母的主观幸福感而言均是最优的居住安排,这为城市住宅设计和住房支持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引导性思路。事实上,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推进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能够缓解养老负担,对提升子女和父母的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意义。

政府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第一,出台针对邻近购房的优惠措施,如果子女选择在父母居住的小区申购另一套住房,将有权优先挑选楼层户型,并享受一定幅度的价格优惠。第二,进一步完善居民水、电、气阶梯价格政策。在当前“一户多人口”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考虑让父母和子女在同一住址或者同一小区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也享受这一优惠。第三,政府部门可以规划设计适合多代共同居住的户型,并在购房价格上给予优惠,推动代际同住家庭比例的增加。第四,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考虑给予更高的税前扣除额度,鼓励子女承担更多的家庭养老责任。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受调查数据的限制、家庭居住安排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居住安排可能存在差异等,这些问题有待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 丁述磊等(2024):《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2. 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

- 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3. 黄启祥(2015):《亲子之情探源》,《文史哲》,第4期。
4. 贾仓仓、何微微(2021):《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内生性视角的再检验》,《人口与经济》,第3期。
5. 金一虹(2010):《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6. 李婷、胡文波(2021):《中国家庭的代际同住及其驱动机制变迁——基于 CHNS1991—2015 的九期调查数据》,《人口与经济》,第6期。
7. 李翌萱(2020):《中国老年人对子女家庭代际支持差异性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7期。
8. 刘汶蓉(2013):《当代家庭代际支持观念与群体差异——兼论反馈模式的文化基础变迁》,《当代青年研究》,第3期。
9. 卢洪友等(2017):《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分析》,《财经研究》,第12期。
10. 任强、唐启明(2014):《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1. 宋月萍(2019):《照料责任的家庭内化和代际分担:父母同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人口研究》,第3期。
12. 孙涛等(2018):《一碗汤的距离:代际养老中合意居住安排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
13. 唐灿(2010):《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第3期。
14. 陶涛等(2018):《代际交换、责任内化还是利他主义——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人口研究》,第5期。
15. 王跃生(2014):《中国城乡老年人居住的家庭类型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16. 韦宏耀、钟涨宝(2016):《代际交换、孝道文化与结构制约:子女赡养行为的实证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7. 吴伟(2021):《代际经济支持的邻近效应——基于 CHARLS 的经验证据》,《人口与经济》,第6期。
18. 巫锡炜、郭志刚(2010):《我国从妻居的时空分布——基于“五普”数据的研究》,《人口与经济》,第2期。
19. 谢桂华(2009):《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社会》,第5期。
20. 许琪(2013):《探索从妻居——现代化、人口转变和现实需求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6期。
21. 许琪(2018):《居住安排对中国老年人精神抑郁程度的影响——基于 CHARLS 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学评论》,第4期。
22. 杨菊华(2008):《延续还是变迁? 社会经济发展与婚居模式关系研究》,《人口与发展》,第5期。
23. 杨菊华、何绍华(2014):《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第2期。
24. 尹新瑞、吴帆(2019):《文化传承与沟通行动理论:和谐代际关系建构的理论视角与方略》,《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25. 张杨波(2018):《代际冲突与合作——幼儿家庭照料类型探析》,《学术论坛》,第5期。
26. 张烨霞等(2007):《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27. 张新辉、李建新(2020):《代际同住对青年女性主观福利的影响》,《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28. Gruijters R.J., Ermisch J.(2019), Patrilocal, Matrilocal, or Neolocal? Intergenerational Proximity of Married Couples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1(3):549-566.

29. Hu S., Mu Z. (2021), Extended Gender Ine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an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93, 102497.
30. Le D.D., Ibuka Y. (2023),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Informal Caregiving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Heterogeneity and Mechanism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17:115630.
31. Lei X., John S., Meng T. et al. (2015),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ARLS National Baseline. *China Economic Journal*. 8(3):191-214.
32. Michielin F., Mulder C.H., Zorlu A. (2008), Distance to Parents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4:327-345.
33. Roh M., Weon S. (2022), Living Arrange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South Kore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0(2-3):717-734.
34. Sheldon J.H. (1948), *The Social Medicine of Old Age: Report of an Inquiry in Wolverhampt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 Szydlik M. (2008),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9(1):97-114.
36. Xiang A.O., Jiang D., Zhong Z. (2015),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Paren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37:126-139.
37. Yu J., Xie Y. (2018), Motherhood Penalt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0:1067-1086.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Distance and Adult Childr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Li Xinheng Guo Jiqiang

Abstract: Scholars have confirmed that living arrangements can affec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of the older people, but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on its impact on the SWB of adult children. Using the 2017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 we distinguish the living distance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own parents and their spouse's parents,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distance on children's SWB.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general, the closer one lives to their own parents, the higher the children's SWB.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robustness checks and dealing with endogeneity. While the closer living distance to one's spouse's parents does not increase the children's SWB.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SWB-improving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mong urban groups, women, adult children whose own parents are under 70 years old, and those whose own parents no longer work. Underlying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closer the living distance is, the more support parents can provide to their children, and the more support children provide to their parents. The main mechanism living close to parents improves children's SWB is the emotional support.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when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live within a walking distance, the effect on the children's SWB is most obvious. Final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Keywords: Living Distance; Children's SWB;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motional Support

(责任编辑:李玉柱)